



中国科学院院史丛书

中国科学院院史拾零

宋振能 / 编著



科学出版社



中国科学院院史丛书

中国科学院院史拾零

宋振能 / 编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科学院院史拾零 / 宋振能编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8
(中国科学院院史丛书)

ISBN 978-7-03-031981-4

I. ①中… II. ①宋… III. ①中国科学院 - 历史 IV. ①G322.2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57400 号

丛书策划: 胡升华 侯俊琳

责任编辑: 郭勇斌 景艳霞 / 责任校对: 宋玲玲

责任印制: 赵德静 / 封面设计: 黄华斌 陈 敬

编辑部电话: 010-64035853

E-mail: houjunlin@mail.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1 年 9 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 × 1092 1/16

2011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7 3/4

印数: 1—3 000 字数: 358 000

定价: 5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序

宋振能同志与我是同年到中国科学院工作的，1951年3月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院部调查研究室工作，同年8月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遗传选种实验馆工作。1952年，我们分别被选送到农业部组织的“全国米丘林遗传育种学习班”（地点：北京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即现今中国农业科学院）学习，并同在一个学习小组，同窗近一年，因此互相比了解。他担任我们学习小组组长，能严格要求自己。他对学习和工作都很认真，分析问题的能力和组织能力都比较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良好印象。

1956年，我被调到陕西杨凌中国科学院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后又调整到中国科学院西北植物研究所工作，先后31年，与宋振能同志没有工作上的联系。1987年，我调回北京的中国科学院院部工作后，到宋振能同志家中拜访过他，畅谈许久。1988年，他从院部转到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工作。

他到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后的21年中，集中较多的精力围绕中国科学院院史和中国近现代生物学史两个主题进行了资料收集与整理，撰写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文章，并于2006年出版了《宋振能文集》。近两年，他发表了《陈毅与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院刊》2009年第2期第122~129页），介绍了陈毅同志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期间（1954~1956年）分管科学院时所作的重要贡献，记述了“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科学院“黄金时代”的形成与历史背景，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历史是一面镜子，温故而知新，它可以给我们一些新的启示。《中国科学院院史拾零》一书的出版又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对了解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科学发展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特此推荐从事科技政策研究及有关的同志参阅。

李振声

2009年8月25日

自序

1950年冬，我毕业于原福建协和大学生物系。当时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是由国家统一分配的。毕业后约两个月，我被通知工作单位是中国科学院。

毕业前，我曾考虑过自己今后的工作去向和志愿。我想出路不外是两条：一条是到学校当生物学教员；另一条是到某研究单位进行科学研究。虽然当时我对中国科学院（简称科学院）很不了解，但它是中国科学的最高殿堂却曾有耳闻，因此接到通知后我觉得这种安排很符合自己的预想和愿望，也为能到这样的单位工作而感到十分荣幸。

1951年3月12日的早晨，在前两天刚下完大雪，街旁、路上还堆满积雪的北京城里，我怀着喜滋滋的心情到那时位于文津街三号的中国科学院院部报到。人事处的干部把我带到院部小楼二层的调查研究室，将我介绍给简焯坡同志。简焯坡在向我简要介绍了科学院和调研室的情况之后，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我的工作就在调查研究室。工作性质是科学行政工作、科研组织管理工作。那时我对这种工作毫无所知，听完介绍后，我觉得这跟我原来的愿望大相径庭，犹如被泼了一盆冷水，我刚来时的喜庆心理顿时被浇得踪影全无。我当即提出对这种工作很不清楚，也不知道怎么着手去做，恐怕难以胜任，希望能让我到生物学的研究单位去做科学研究。但他却说现在科学院最缺的是这方面的人才，需要有各门学科专业知识的人来做这种工作。他还以自己为例，说他本人原来就是搞科研的，也正是因为工作需要才被调到院部，他劝我还是要以工作需要为重，服从组织上的决定。当时我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名团员，毕业后又刚接受过要服从组织分配的教育，只好无奈地接受了。正式上班以后才知道，简焯坡同志当时是调查研究室的专员（相当于副处长），分管生物学和地学方面的工作，他就是我到中国科学院后的第一位直接领导，在院部工作的初期我是在他的指导和关怀下成长的。虽然从1955年学部成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在一起工作过，但我们之间的师生和同志情谊却一直保持到2003年他不幸因病逝世。

从1951年到现在，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事事沧桑。我已从昔日那个经常活跃在体育场所、朝气蓬勃的青年，变成了鬓发斑白、抱病度日的垂垂老者。何曾想到，就是从当年简焯坡同志跟我的那次谈话起，我跟中国科学院结下了



“不了缘”，并在这个中国科学的圣坛上度过了大学毕业后的整个一生。

回顾在中国科学院的 50 余年生涯，大致可以划分为下面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1 ~ 1987 年。概括地说，这是我主要从事生物学科技组织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阶段。这段时间，我除了 1980 ~ 1982 年约两年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工作外，其余的时间都是在中国科学院院部，而时间最长的要算是在生物学部。在院部，我的工作单位曾换过不下十次，先后在调查研究室、计划局、学术秘书处、生物学地学部、生物学部、黄淮海办公室、“五·七”办公室、业务一组、业务二组、二局、一局、生物学部、生物局等单位工作。不过值得庆幸的是，除“五·七”办公室外，不管工作单位怎么变来变去，但万变不离其宗的却是：我所做的依然是生物学科技的组织管理和服务工作。

虽然我早就有在科技报刊上发表作品的兴趣和愿望，可是在这个时期里，由于政治运动频繁以及科技行政工作的性质不能像科研工作那样持续稳定地进行等种种原因，我也就没有心思去考虑进行某一方面的写作或著述。这个阶段在科技刊物上刊登的少数几篇文章，大都是由于工作关系，临时被指定或一时感触而匆忙写出的作品。例如，收入本书的“调查河北省晋县除草防蚜功效报告”，是我在科技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这并不是我的投稿，发表前我也毫不知情。只是在报告发表后才有人向我透露，这次调查是郭老（郭沫若院长）授意调研室派人进行的，调查报告也是郭老授意《科学通报》刊登的。为了宣传推广我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昆虫研究室做出的这项对农业增产有益的科研成果，郭老还凭他的天才智慧、学识和灵感，亲自写出防治棉蚜歌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纵览 30 多年在科学院院部的工作，对我来说是个难得的锻炼，并且获得了宝贵的收获。

第一，我的工作性质，使我有机会接触和结识不少生物学部的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和院内外知名的老科学家。他们大都是我国现代生物学、农学、林学和医学及其分支学科的奠基人、开拓者和权威专家，理所当然，我把他们尊奉为我的老师或是老师的老师，聆听他们对学术问题的见解和对科技工作的意见，使我学到比较广泛的生物学等基本知识，得到工作方向任务的启示。在工作中遇到疑难问题，我也常从向他们讨教中得以释疑解惑。同样我也结交了全国生物学界尤其是科学院的许多中、青年科学工作者和其他朋友，得到了他们的帮助。

第二，与上述相联系，我对院属生物学研究机构和院外主要有关单位的科研情况和重要成果能够有概略的了解。对于国际上生物学特别是重要和前沿领域的科研动态和最新进展，也能略知一二。这些，都给我顺利开展工作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第三，认识到需要经常注意学习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科技工作的方针政策，

学习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知识和一些规律，包括科技先进国家发展科技的一些经验等，并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使工作少走或不走弯路。

此外，我还学习到如何开展工作的一些方式方法等。

当然，在我的工作中也存在不少不尽如人意的缺点以至错误。例如，到科学院初期，曾有数年存在不安心院部工作的思想；一般化的工作多，深入、系统的工作少；程式化的工作多，在工作中求新求变少等。

总之，我没有虚度在科学院院部的 30 多年光阴。现在，我不仅没有为在院部工作而反悔和怨艾，相反，我为能被安排在这样的岗位上而感到欣慰和幸运。

第二阶段，1988～1993 年，这个阶段我的主要工作是编辑和写作。

1987 年秋，我离开院部到院属的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工作。在离开院部前，我对自己的去向就有了一些盘算。当时我已年近花甲，我想以我这样的年龄和经历，要到生物学的研究机构去做实验研究已不可能，根据以往的工作状况和个人志趣，我有意围绕中国科学院院史和中国近现代生物学史做些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不过这也只是个泛泛的工作范围，并没有想好就某个领域或专题做深入的探讨和写作。

到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后，我还承担了《中国科学院院刊》（以下简称《院刊》）的编辑任务。从此，除了完成兼任的《院刊》编辑工作外，我就专心致志地对我想过的一些题目着手资料的收集和整理，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

1991 年，我办理了退休手续。可是由于《院刊》职务的任期还没有届满，我的姓名虽然已经列入退休人员的花名册，实际上编辑写作的工作还在继续进行。由于精力比较集中，时间也有比较充分的保证，在这短短的五年里，我所发表的文章和资料反倒比前 30 余年多出不少。收入本集的多数作品，大都是在这个期间内完成的。但是话又得说回来，如果没有以往多年的工作和经验积累，要取得这样的收获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要进行院史等方面的一些研究和写作，必须下工夫收集查考有关的档案资料。中国科学院办公厅档案处是保藏这方面珍贵史料的宝库，为了挖掘和收集那里的宝藏，这段时间里我成了中国科学院档案处的常客。因为我是在院部工作多年的老人，当我查找和借阅档案时，档案处的许多同志给了我特殊的照顾和方便，在此我向他们谨表衷心的感谢。

第三阶段，1994 年至现在。简单地说这是个休闲治病的阶段。

1992～1993 年，由于我不自量力，除了我原来的编辑写作任务之外，又承揽了两件比较繁重的编纂工作。一件是接受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的委托，由薛攀皋、季楚卿和我三人合作编写《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发展史事要览》；另一件是接受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聘请，担任《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



篇·生物学卷》的副主编。当时因主编朱弘复教授年迈有病，编纂传略的全部工作实际上都由我负责进行。就是这两件事，使我 1993 年全年几乎都是在不分昼夜地紧张劳作，疲惫不堪。没有想到，正是因为这种超负荷写作已经为病魔的侵袭埋下了祸根。果然，在不久后的 1994 年春节期间的一个早晨，当我准备起床去参加传略编委会的会议时，突然晕倒在床上，几天后我因身体不适只好住进医院接受治疗，经医生检查诊断，我患了脑梗死等疾病。此后，我便基本停止了编辑写作活动。

在这十二三年的时间里，我经常到医院看病治病。在身体状况许可的情况下，断断续续地编完生物学家传略的第二卷。我生病前，该卷的编纂已完成过半，把后一小半的扫尾工作做完以后，我便辞掉了这份副主编的兼差。此外，还写了一篇纪念郑作新老师的文章。

以上就是 50 多年来我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和生活大致轮廓的简要回顾。

刊印本集时，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院史研究室王扬宗、张藜同志要我做个自我介绍，着重谈谈“我和中国科学院”的关系。是为序。

宋振能

2011 年 2 月

前 言

2006年12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院史研究室、中国科学院院史工作委员会刊发了拙著《宋振能文集》（以下简称《文集》），供内部交流使用。在《文集》刊印过程中，我曾校阅过两次。《文集》印发后，我又仔细校阅了一遍，发现仍有若干处错误（主要是由于我粗心大意所致，与编辑出版部门无关），同时我也考虑还有一些地方需要补充修改。在《文集》刊印前，我就希望能公开出版，出现了以上情况后，我就更加坚定了尽快修改后正式出版的决心，因此，我就没有对已经发现的错误补发勘误表进行更正。

编著本书，主要是以《文集》为基础，其中的原《文集》前言、自序和大部分文章、资料还是《文集》原有的，只作了一些变动和补充修改。

本书和《文集》不同之处有以下几点：

（1）书名改为《中国科学院院史拾零》。

（2）对作品的编排做了一些变动，把《文集》中的作品由原来划分的三部分改成五部分。这五部分是：①关于中国科学院建立组织机构、某些制度等的回顾和探讨；②对涉及科学院的一些重要专题做比较系统的史料收集和整理；③纪念对科学院作出重要贡献的国家和科学院领导人、著名科学家的文章；④访谈录及会议简报；⑤有关科学院生物学研究与发展问题的撰述。

（3）在《文集》前言中，我曾提及我还“编写或参与编写了一些会议纪要、简报以及其他一些作品，因为没有正式或公开出版发行，也就都没有收入这个集子”。2003年，《院史资料与研究》编辑从院档案室找到我编写的“百家争鸣”座谈会简报作为史料刊登在该刊上。该简报既已正式刊出，我就把它收入本书。

（4）增加了五篇近年来新发表的作品，一篇是纪念陈毅同志的文章，另外四篇是访谈录及会议简报；删除了《文集》中的“大事记”和一篇以李森科错误学术思想为指导而编写的书评。

（5）对已发现的《文集》中的错误和我认为需要补充修改的地方做了改正和修订。

承蒙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院史研究室一再积极支持，本书才得以公开出版；中国科学院原副院长、著名小麦遗传育种专家、2006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得者李振声院士在百忙之中为拙著写序，我深以为幸；中国科学院



植物研究所副馆员胡宗刚先生指正了《文集》中的一处重要缺漏；我的老领导、原生物学部副主任过兴先教授，我的老师郑作新院士的夫人陈嘉坚女士，我的长期同事、原生物学部副主任薛攀皋教授，植物研究所编审夏振岱女士都为本书提供了照片，特别是《院史资料与研究》杨小林副编审不仅提供了珍贵的照片，而且还帮助提供了几篇作品的电子稿件；我的外甥女宋勤副教授和儿子宋文戈（不久前回国，在美国时曾任高级软件工程师）帮我用计算机打印了一些书稿内容；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熊卫民副研究员做了许多编辑工作。在此，对于他们的热诚帮助和大力支持，一并谨致以深深的谢意。

本书虽已改正了《文集》中的一些讹误，但还是难免存在错漏和其他问题，敬希读者给予批评赐教。

宋振能

2009年8月

《宋振能文集》前言

这个集子，是我到中国科学院后科技书刊、报纸登载我的文章和资料的汇编。

为什么要把这些作品汇集付印？事情出于偶然。有一天我想找过去发表的一篇文章参阅，但在家里遍寻不得，最后只好到科学院图书馆去借阅。由此使我萌生出一个想法，反正近年来闲暇无事，为什么不把过去多年分散在各处的作品收集在一起，作为一种休闲的消遣，查看也方便。根据过去写作的情况和作品的性质，这些作品可以粗略划分为三类：一类是关于我院建立组织机构、某些制度等的回顾和探讨以及纪念一些院领导人的文章；另一类是就涉及全院的一些重要专题，做比较系统的史料收集和整理；再一类是有关生物学和生物学家方面的撰述，这些撰述与科学院都有密切关系，实际上也是院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总的看来，本集也可以说是一册微不足道的、很小一部分的院史文献资料。这本文献资料，尽管它们数量有限，而且多系不能登堂入室的肤浅之作，但“敝帚自珍”，之所以把它汇编付印，对我来说，既便于需要时翻阅查考，同时也是给自己留下一个纪念；而对于其他读者，特别是一些有兴趣研究和了解院史的有心人，或许也具有史料方面的某种参考价值。

收入本集的作品，并不能完全体现我在科学院特别是在院部的全部工作和有关活动。不过，通过它们，多少可以看出我以往工作的一鳞半爪。

刊印本集，还有几点需要说明：

一、发表在有些书刊中的作品，有些是在会议上发言或访谈时记录的整理，原来没有标题，现在的标题是这次刊印时新加的。

二、发表本集作品的书、刊和报纸的名称以及年月、卷期等，都在每篇的篇首脚注中说明。这些出版物中，《院史资料与研究》是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编印的内部资料，其余都是公开出版发行的。与别人合作或我参与写作由别人署名的作品，具体情况也在注释中一并说明，未加说明者都是我个人的作品。

三、我还编纂或参与编纂了一些其他作品，因其都已独立成书（册）出版，因此没有收入本集。这些书籍有：

（一）《遗传学座谈会发言记录》



这本以“遗传学座谈会会务小组”名义编辑发行的册子，实际上主要是我编辑的。当时我是这个座谈会的工作人员，并被指定担任记录。会后我把经发言人审阅修改的记录整理（有一部分是发言人给我的发言稿）编辑成册。由时任生物学地学部学术秘书的过兴先同志写了前言，送交科学出版社于1957年4月出版，当时只在内部发行。事隔多年，李佩珊等四位同志编写的《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一书，由商务印书馆于1985年11月出版并公开发行。该书把《遗传学座谈会发言记录》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全文登载。

（二）《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发展史事要览1949—1956》（薛攀皋、季楚卿、宋振能）

由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编写，1993年印行。

（三）《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篇·生物学卷1》（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1996年7月）

（四）《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篇·生物学卷2》（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2001年1月）

上述两本生物学家传略得以出版发行，是各位撰稿人和编委们的集体劳动成果，为编纂该书我曾付出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编委、责任编辑韩存志同志也做了大量工作。

此外，我还曾替中国科学院的一些原领导人，如裴丽生、秦力生、武衡等同志草拟过若干报告或总结的稿子，编写或参与编写了一些会议纪要、简报以及其他一些作品，因为没有正式公开出版发行，也就都没有收入这个集子。

四、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党和政府的大力号召下，我国曾掀起了“学习苏联”的热潮。在学习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搬用了类似苏联对学术问题采用政治、行政手段“支一派，打一派”的错误，使全国各地不同程度地重演了苏联“李森科事件”的悲剧。比如把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说成是“伪科学”、“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而把李森科标榜的“米丘林学说”、“农业生物学”说成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等。受其影响，在我当时写作的有关米丘林学说的少数文章中，也存在着这方面的错误和其他一些问题，我自当引以为训。但是，这些作品在收入本集时，为了忠于历史，尊重客观事实，并藉资鉴戒，我仍然保持了文章发表时的全文原貌。

限于自己的思想水平和写作能力，本集难免存在着不少疏忽和纰漏，如蒙读者不吝赐教，将不胜感激。

本集得以编成刊印，首先得感谢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原院史研究室主任樊洪业同志，他曾出题并组织我写作了其中的一些作品，还为若干作品提供了发表的园地，本集的刊印也得益于他的支持和介绍。我还得

感谢当时中国科学院档案处的许多同志，特别是袁慧、潘亚男、胡秀英、王立新等同志，没有她们的关照和帮助，要完成本集不少作品的写作是不可能的。最后感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院史研究室的两位研究员王扬宗、张藜和学报编辑部主任艾素珍同志。他们对“自序”的写作和作品的编排等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并对本集的刊印出版给予了热诚的支持。

宋振能
2006年10月

目 录

序

自序

前言

《宋振能文集》前言

第一部分 中国科学院组织机构、制度建立的回顾

中国科学院建立专门委员制度的回顾	2
建院初期科研机构发展的回顾和探讨	20
中国科学院学部历史概况	33
关于建立中国科学院学部的一些背景情况	43

第二部分 一些重要专题的史料选汇

中共中央、国家领导机构及其主要领导人对中国科学院的指示（摘录）	46
中国科学院直属机构成立和变动记略	74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科学家获国外和国际科学机构院士、 通讯院士一览表	128

第三部分 缅怀科学院发展史上的重要领导人、著名科学家

陈毅与中国科学院	134
竺可桢副院长对发展我国综合考察事业所作的突出贡献	145
深切缅怀汪志华同志	150
怀念我的老师——郑作新院士	152
著名植物学家林镕院士传略	155

第四部分 访谈录及会议简报

钱三强口述：筹建科学院前后我参与的一些事情	164
“百家争鸣”座谈会情况报道	166
呼唤科技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宋振能先生访谈录	178



为制定“三十六条”做调研——宋振能先生访谈录·····	180
我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期间的一段经历（1965 ~ 1977 年） ——宋振能先生访谈录·····	188

第五部分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研究与发展的相关论述

对中国科学院生物科学发展战略的意见·····	210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 40 年·····	219
协调地发展我国的生物学事业·····	234
中国科学院所长会议生物学地学组会议总结·····	239
关于长江救鱼问题的正确决策——通过科学研究、专家论证和实地考察 解决学术争端的一个案例·····	251
为在我国进一步发展米丘林学说而斗争·····	256
调查河北省晋县除草防蚜功效报告·····	259
进展迅速的我国生物工程研究和开发·····	262
我国花药培养和单倍体育种研究的成就·····	264

第一部分 中国科学院组织机构、 制度建立的回顾

中国科学院建立专门委员制度的回顾*

内 容 提 要

中国科学院建院初期，曾聘请国内大批科学家担任专门委员，作为中国科学院的学术顾问。专门委员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在科学院的创业时期留下了值得记述的史绩。本文对建立专门委员制度的缘起，产生专门委员的经过以及专门委员的性质、任务、作用等作了介绍和回顾。

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科学院）成立以后，于1950~1953年选聘了院内外有代表性的知名科学家200余人担任科学院的专门委员。在全国范围内吸收这么多科学家参与国家最高科学机构的工作，这在中国科技史上还是第一次。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专门委员的作用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专门委员的名称也不像学部委员那样被科技界广泛知晓，但专门委员制度的建立和实行，对于科学院创立初期全院性重大问题的决策，促进科学院与院外有关机构特别是高等院校的合作和联系，以及其他一些方面仍然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同时也为后来中国科学院学部的建立和学部委员的选聘打下了必要的基础，因而具有历史意义。

一、建立专门委员制度的缘起

中国科学院实行专门委员的制度，源于建院之前提出的在科学院内设立评议会或科学工作委员会的意见。

1949年6月，在召开新政协筹备会期间，中共中央已经指派宣传部长陆定一负责科学院的筹建工作。协助他工作的是恽子强和丁瓚（建院初他们即被任命为办公厅副主任，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钱三强（建院初被任命为计划局副局长、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也被邀参加。大约在1949年9月，

* 本文原载《中国科技史料》第13卷（1991）第4期第38~52页和《宋振能文集》第1~17页。上述刊物和《文集》中关于当时委员的人数统计有误，此次出版时已作了改正。今后请以本文的统计和叙述为准。承钱三强、黄宗甄、简焯坡三位教授提供重要情况，对他们的热情帮助谨致深切的谢意。